看「輕」自己

國 良

如是我見

做人做事，要不迷失方向，總須有個合理可行的坐標。行爲處世，要不左右搖擺，就得把自己放在適當的位置，這樣才能以平和的心態看人看己，以清醒的頭腦對人對事。世界第二大軟件公司CA公司董事長王嘉廉，是這樣闡述他的經營理念的：「CA實際上是一家大公司，但在我們思維中卻是一家小公司。沒有什麼了不得。」可見，看「輕」自己，不覺得自己了不起，是爲了做更了不起的事業，是爲了增「重」自己，顯然這是成就大業的基點，是通向美好未來的長梯。相反，一事當前，先看「重」自己，必然導致盲目樂觀，狂妄自大。而傲慢之時，就是危險之時。看「輕」自己，才能自重、自珍和自愛，這種「輕」，如同太極推手，實可四兩撥千斤。如同輕聲細語，有時遠比高聲大嗓來得有震撼力。

重與輕，既充滿矛盾又辯證統一。山尖之「重」，代表了一種高度；針尖之「輕」，體現了一種力度。哲人畢希納說，人就是「灰塵、沙粒和泥土」。人本身就是很輕的東西，如果做了人類想成仙，生在地上想上天，老把自己當珍珠，怕是時常會有要被埋沒的痛苦。看「輕」自己，體現的是一種謙虛中的堅定有爲、清醒中的苦心經營，是在人生和事業目標中的合理定位。看「輕」自己，是人生和事業的起點，更是一種永恆的精神磨練。掘到第一桶金的人，往往情緒膨脹，「氣壯如牛」，有人還有「暴發戶」的嘴臉，趾高氣揚的味道。但當成了眞正的富翁之時，往往就會「身輕如燕」，謙和起來。

看輕自己，是一種簡單的行爲方式。世界是複雜的，簡單的東西才是最美的，許多簡單的行爲方式才讓人敬仰。人如果再不簡單，就會增添更多的糾葛和煩惱。人不看輕自己，就會變得更複雜，而一複雜，痛苦就會接踵而來。看輕自己，是拋棄城府深沉的一種昇華，是開掘靈魂深度的一種顯示。看輕自己，當然是要有分寸的，自知過了頭，變成了自卑也不好。這種「看輕」不是喪失自信心，缺乏進取心，而是不張揚，不張狂。這樣反而能促使自己擺正位置，端正姿態，不斷進取。這樣看「輕」和小視自己，才更見精神和境界。

趙景深愛《荷花》

許定銘

醉書亭

趙景深（一九〇二至一九八五）是現代著名的學者，他的著述甚多，以翻譯及文學史類爲主，尤其一些寫文人文事及回憶錄性質的書最爲重要，如《文人剪影》、《文人印象》及《文壇憶舊》等，更是新文學研究者必備的工具書。但，在純創作上，他只寫過小說集《梔子花球》（又名《爲了愛》及《失戀的故事》）、散文集《小妹》和詩集《荷花》。

《荷花》（上海開明書店，一九二八）初版只印了一千五百冊，八十年後的今天，非常罕見。這本僅七十四頁的小詩集，共收了趙景深一九二二至二七年間的詩作三十八首，全按寫作時間順序安排。

他在《前記》中說，寫詩與心情關係密切，前面的十餘首，寫於初涉社會的頭兩年，當時「依舊是孩子般的心情，所以充滿了愉快，歌頌着花，光，愛，出產也較多。」後來因爲工作多了，接觸社會越深，寫詩的興趣也日漸減退。最後，他終於慨嘆「近來逐漸麻木，連夢都做不成了，詩也不會唱了，也許這第一詩集也就是我最後的詩集了罷？」

《荷花》這件漂亮的書衣，是錢君匋的傑作，較諸集內那些比「胡適體」略進一步的自由詩，更有藝術性，更吸引人。

《我的前半生》中的王國維

段懷清

燈下集

有關王國維之死，如果我們接受「殉清死節」或者「死諫」之類的說法，那就不妨看一看王國維「死諫」的對象、當時已經遜位的宣統皇帝溥儀又是如何看待王國維以及他的自沉的。

作爲清朝最後一個皇帝，溥儀出生於一九〇六年，即清光緒三十二年。是年王國維二十九歲（王國維出生於一八七七年，即清光緒三年）。而當溥儀一九〇九年三歲登基的時候，王國維已過而立。光緒三十四年，也就是後來的宣統皇帝溥儀兩歲的時候，王國維隨羅振玉入京，任學部總務司行走，這大概是王國維開始自己與清皇朝發生一種具體而切實關係的開始。以至於後來有關王國維之死而引發的「殉清死節」或者「死諫」等說法，大抵都與王國維與清王朝乃至清皇室之間這種具體而切實的關係有關。但別說是王國維，就連將王國維引進風雨飄搖之中的大清朝廷的羅振玉，當時皆無緣與當朝天子會面。

王國維擔任上述學部總務司行走不久，就爆發了辛亥之役，清王朝被推翻。王國維又隨羅振玉，攜家流落日本。直至民國十二年，也就是一九二三年，王國維等人因極力鼓吹推動溥儀「復辟」的蒙古升允之薦舉，任職溥儀南書房行走。這大概應該算王國維近距離接觸溥儀的開始。羅振玉《海寧王忠愨公傳》中說王國維「先世籍開封，當北宋時，其遠祖曰珪、曰光祖、曰稟，三世均以武功顯，而兩世死國難，《宋史》有傳」。這段文字尤爲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於：王國維祖上就有盡忠死節之傳統。

在溥儀後來的回憶錄《我的前半生》中，第一次出現王國維，是在溥儀已經遜位十餘年後：

> 我下了決心。我也找到了「力量」。
>
> 我在婚禮過去之後，最先運用我當家做主之權的，是從參加婚禮的遺老裡，挑選了幾個我認為最忠心的、最有才幹的人，作為我的股肱之臣。被選中的又推薦了他們的好友，這樣，紫禁城裡一共增加了十二三條辮子。這就是：鄭孝胥、羅振玉、景永昶、溫肅、柯劭慊、楊鍾羲、朱汝珍、王國維、商衍瀛等等。我分別給了他們「南書房（皇帝書房）行走」、「懋勤殿（管皇帝讀書文具的地方）行走」的名銜。

從這段文字看，王國維與另外十餘人一道，被試圖擺脫紫禁城的封閉或者獲得自由獨立的已經遜位的溥儀選爲股肱之臣。而溥儀的「旋乾轉坤」「密圖大計」的理想，也就主要依靠這些在民國依然留着辮子的忠貞不貳的臣子去實現了。

但溥儀很快就發現，即便是這些被他一度引爲股肱之臣的「清流」們，大多也是裝腔作勢、誇誇其談之人，不過是爲了一己之私、沽名釣譽或者光宗耀祖而已，甚至還不乏招搖撞騙之徒。這對聽信了清流們「內自振奮而外示韜晦」的進言、一心圖謀恢復——「光復故物」、「還政於清」——的溥儀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反諷，也讓他在領略了一番人生百態之餘，徒生一種遊戲心理：

> 他（羅振玉）在清末做到學部參事，是原學部侍郎實熙的舊部，本來是和我接近不上的，在我婚後，由於升允的推薦，也由於他的考古學的名氣，我接受了陳寶琛的建議，留作南書房行走，請他參加了對宮中古彝器的鑒定。和他前後不多時間來的當時的名學者，有他的姻親王國維和以修元史聞名的柯劭慊。陳寶琛認為南書房有了這些人，頗為清室增色。
>
> ……
>
> 羅振玉並不經常到宮裡來，他的姻親王國維能替他「當值」，經常告訴他當他不在的時候，宮裡發生的許多事情。王國維對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這位老實人總覺得欠羅振玉的情，而羅振玉也自恃這一點，對王國維頗能指揮如意。我後來才知道，羅振玉的學者名氣，多少也和他們這種特殊瓜葛有關。王國維求學時代十分清苦，受過羅振玉的幫助，王國維後來在日本的幾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羅振玉在一起過的。王國維為了報答他這份恩情，最初的幾部著作，就以羅振玉的名字付梓問世。羅振玉後來在日本出版、轟動一時的《殷墟書契》，其實也是竊據了王國維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羅、王二家後來做了親家，按說王國維的債務更可以不提了，其實不然，羅振玉並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過的代價，而且王國維因他的推薦得以接近「天顏」，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國維處處都要聽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國維就任清華大學國文教授之後，不知是由於一件什麼事情引的頭，羅振玉竟向他追起債來，後來不知又用了什麼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國維，逼得這位又窮又要面子的王國維，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於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進昆明湖自盡了。

溥儀曾任傀儡皇帝的偽「滿洲國」皇宮舊址（資料圖片）

對於王國維，溥儀似乎有着比羅振玉稍好的印象與評價。我們當然不會完全聽信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對於羅、王二人的評價，包括對羅王之間學術關係上的議論，但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一個事實是，當羅、王二人將自己的人生氣節和政治理想很大程度上寄託在已經遜位的溥儀身上，寄託在已經被民國推翻了的清王室的恢復（復辟）之上的時候，他們似乎忽略了那個寄託他們理想的宣統皇帝，究竟又是如何看待他們的。

如果說在《我的前半生》中，溥儀給我們勾勒出了一個近於「混世」的羅振玉形象，那麼比較而言，王國維的形象，大抵還算「端正」：

> 王國維死後，社會上曾有一種關於國學大師殉清的傳說，這其實是羅振玉做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覺中，成了這篇文章的合作者。過程是這樣：羅振玉給張園送來了一份密封的所謂王國維的「遺摺」，我看了這篇充滿了孤臣孽子情調的臨終忠諫的文字，大受感動，和師傅們商議了一下，發了一道「上諭」說，王國維「孤忠耿耿，深堪惻憫……加恩謚予忠愨……賞給陀羅經被並洋二千元……」羅振玉於是一面廣邀中日名流、學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園裡為「忠愨公」設靈公祭，宣傳王國維的「完節」和「恩遇之隆，為振古所未有」，一面更在一篇祭文裡宣稱他相信自己將和死者「九泉相見，諒亦匪遙」。其實那個表現着「孤忠耿耿」的遺摺，卻是假的，它的翻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見」的羅振玉。

顯然溥儀並沒有糊塗到足以讓那些所謂的股肱之臣肆意玩弄於股掌之間。對於羅振玉與王國維之間的恩恩怨怨，他似乎也有着超乎一般人印象的「洞察」與「清明」：

> 這篇祭文的另一內容要點，是說他當初如何發現和培養了那個窮書記，這個當時「黯然無力於世」的青年如何在他的資助指點之下，終於「得肆力於學，蔚然成碩儒」。總之，王國維無論道德、文章，如果沒有他羅振玉就成不了氣候。那篇祭文當時給我的印象，就是這樣。
>
> 只是即便是這樣的評價，顯然與王國維不惜以生命之軀而殉之的那個理想之間，依然有着天壤之別。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日杭州華家池

老子的「艷福」

齊 夫

自由談

一世清心寡慾的老子，萬萬沒有想到，生前寂寞，孑然一身的他，兩千多年後，竟然有大批美女蜂擁而至，競相當他的「形象大使」，讓他「受寵若驚」。

近日，老子故里河南周口鹿邑縣面向全國海選美貌、睿智的青年做國際老子文化節的形象大使，這次形象大使選拔分報名、海選、複賽、決賽四個階段，將通過選手演示歌舞、書畫等才藝，以及規定的旗袍、休閒裝、晚裝着裝秀比賽，選拔出十位集睿智、美貌、氣質、風度、才藝於一身的高素質青年。原來還準備進行「泳裝秀」，後來怕當地老百姓難以接受而作罷。

想想看吧，退一步說，假如鹿邑縣有關方面力排衆議，「泳裝秀」如期舉行，萬一那一大群美女嬌娃身着三點式，春光泄露，玉體橫陳，爭着給老子「投懷送抱」，頻送秋波，不知道李老夫子還能否把持得住，有無柳下惠坐懷不亂的本事。萬一他老人家生出雜念，春心萌動，有了「身體反應」，當場出醜，壞了他老人家一世英名，又如何是好？如此這般興師動衆給老子大規模選美，眞不知是給他老人家「添福」，還是褻瀆老子的清譽雅望。

孔子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就連孔子自己還有「子見南子」一回「準軼事」，不知道這一判斷是否包括他的老師老子，至少從眼下能見到的有關老子的記錄來看，老子並無如何好色的緋聞軼事，《道德經》裡似乎也沒看到有什麼明顯的、暗示的艷詞淫句。

可見，老子儘管也是肉胎凡身，也有七情六慾，可他絕非登徒子之類。他的成就、他的志向、他的興趣，都在於搞學問、作研究，爲聖賢立言，爲民衆指路上。

因而，作爲後世子孫，若要眞心實意宣傳老子思想，弘揚老子主張，擴大老子家鄉的知名度，也大可不必打美女牌，搞邪門歪道，顯得不倫不類，無聊可笑，老子的在天之靈會不安的。

平心而論，身爲老子家鄉的後人，開發老子，吃老子飯，繼承老子文化的，都無可非議，發展文化產業，也不是不能利用歷史名人「借殼上市」，但一定要尊重歷史，尊重歷史名人，合情合理，合乎風俗民心。

據鹿邑縣有關負責人說，去年，鹿邑縣就依靠老子故里和老子文化，實現綜合收入三千多萬元。

嘗到老子甜頭的鹿邑人，今年想再上層樓，二度輝煌，也在情理之中，可是，除了「美人計」，除了「海選」，除了「泳裝秀」，莫非就沒有別的上點檔次、有點文化品位的更富創意的思路嗎？

「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音希聲，大象無形」！一生樸素、低調，無意仕途、經商，也與聲色犬馬無涉的老子，如今被人強加「艷福」，身邊美女如雲，讓他萬般無奈，哭笑不得，我們也似乎隱約聽到九泉之下老子的嘆息。

《論語》在海外

惠 斌

東西走廊

一九八八年一月，在巴黎召開的第一屆諾貝爾獲獎者國際會議上，七十五位與會代表經過四天的討論，提出了十六條以「面向二十一世紀」爲主題的結論，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人類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二十五個世紀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西元二八五年，朝鮮百濟王子派遣王仁渡海向日本王子獻《論語》和《千字文》。此後，日本出現了最早的學校「學問所」，專門向王子、大臣們傳授儒家經典。而在日本流傳的《論語》各種註釋本中，最具權威性的是伊藤仁齋著的《論語古義》和荻生徂徠著的《論語徵》。

孔子思想在西方流傳至少已有三百年的歷史。早在十六世紀時，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到中國後，就曾將《論語》粗略地翻譯成拉丁文。隨後，至少有來自法國、葡萄牙、比利時和奧地利等國的十七個耶穌會會士對此進行了修改和研究。

不過，《論語》最早的西文版（拉丁文）《中國哲學家孔子．用拉丁文解釋中國人的智慧》於一六八七年在巴黎出版，編譯者是柏應理、殷鐸澤、恩理格、魯日滿四位耶穌會會士。一六八八年和一六九一年，法文版《中國哲學家孔子的道德箴言》、英文版《中國哲學家孔子的道德箴言——孔子活躍於我們的救世主耶穌基督到來的五百年前，本書是該國知識遺產的精華》先後被翻譯出版。一八六一年，蘇格蘭傳教士理雅各在香港出版了《論語》的英譯本，還首次使用了「Analects」這個詞作爲書名（意思爲「討論和評論的選段」），而它也成爲後來所有《論語》學術譯本的母本。

《論語》被介紹到西方後，隨着孔子思想逐漸爲歐洲學界所了解，許多西方人對孔子尊敬有加。各界有識之士認爲：「孔子的教誨屬於全人類。他和莎士比亞一樣，都有着實用主義哲學：相信和諧、等級、社會秩序和奉行愛國主義。」孔子因而與希臘古代哲人蘇格拉底、柏拉圖一樣享有盛名，並被譽爲「偉大文明奠基者」。西方推選的「一百個歷史上最有影響的人物」中，孔子排名爲第五位；美國人則尊奉孔子爲「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

如今，《論語》和孔子在國外更加盛行。日本長崎市於一八九三年修建的孔子廟的西廊大理石上所刻全部《論語》，現在還保存完整，供人觀賞。在新加坡，政府按照孔子的倫理思想，制定並實施了倫理教育計劃，規定以《論語》作爲中小學倫理教育的教材；新加坡還經常舉辦文明禮貌活動，《論語》中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成爲這項活動的指導思想。德國人也把孔子和康德共同尊爲教育學的奠基人，柏林得月園的入口處，更是矗立着兩米多高的大理石孔子塑像，塑像花崗石基座上刻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孔子這一中國古代哲人的形象出現在偉大哲學家輩出的國度的公共場所，從一個側面說明孔子在德國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萬歲」源起與演變

劉 輝

文史叢譚

在我國西周以前的古代文獻中，「萬歲」一詞未曾出現過。自戰國開始，「萬歲」一詞才屢屢出現於文獻記載之中，這時的「萬歲」，只是人們的歡慶祝福之語，沒有政治意義。宋代張昊他的《雲谷雜記》中所記錄的：「《呂氏春秋》宋康王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悉應；《戰國策》馮諼燒債券，民稱萬歲；藺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左右皆呼萬歲，」就爲此意。

「萬歲」一詞何時才被賦予政治色彩，即成爲帝王的代稱呢？有些人認爲是在秦漢以後，臣民們才開始直呼皇帝爲「萬歲」。其中有人認爲「萬歲」一詞具有神聖尊嚴始於漢高祖劉邦，如劉邦臨朝時「殿上群臣皆呼『萬歲』」，並在此時由叔孫通草創了一套與之相輔的禮儀，使劉邦因此感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另有人認爲，「萬歲」成爲最高統治者的代名詞始於漢武帝劉徹，是漢武帝精心炮製的政治謊言的產物，即所謂「山呼萬歲」。這是因爲武帝獨尊儒家，而儒家則將「萬歲」定於皇帝一人，若他人使用，則成了僭越。據《後漢書．韓棱傳》載，大將軍竇憲奉詔回長安，「尚書以下議拜之，伏稱『萬歲』。棱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慚而止」。說明此時「萬歲」之制已經確立了。

「萬歲」一詞由歡慶祝福之語而演化爲皇帝的專稱，使其內涵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成爲我國語言文字中獨特的政治性專用名詞，其起源時間在我國漢代，自漢以後，「萬歲」一詞的使用物件與場合日趨嚴格，但也並不是像有些人所說的漢代之後，「萬歲」只限於皇帝一人，其他概不能用。其實，「萬歲」一詞至少在唐代，由於「民間口語相沿未改，仍有人呼『萬歲』，以爲慶賀。」唐代以後，才「莫敢之」，只對皇帝才能稱「萬歲」。

老北京的錢莊

許 揚

文化經緯

內地熱播的電視劇《喬家大院》，使觀衆看到了舊時銀錢匯兌業經營的情況，劇中用成隊的馬車運送銀兩的畫面，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國在錢莊和銀行出現以前，銀錢在異地間流通存在很多困難，舊時以白銀作爲貨幣，運送三十萬兩銀子，約重十噸，走幾百里上千里路，很不安全，即使請了保鏢，增大了經營成本不說，也經常出問題。由此有人想到創辦票號，晉商雷履泰和他開辦的日升昌顏料舖兼票號即是早期最知名的。

清乾隆年間，山西人雷履泰開了一家日升昌顏料舖，經營的顏料中有一種原料銅綠，產地在四川。當時如果到四川購買銅綠需要攜帶大量現銀，很不方便，也不安全。雷履泰想出了「易地取款」的辦法，在四川開了分號，購貨款可以由四川的分號代付。後來日升昌又在一些大城市相繼開了二十幾家分號，不但爲本號服務，也爲其他客商服務。譬如有的商人要從北京往四川匯款，只需把銀兩交到北京日升昌，攜帶由日升昌開據的匯票，到四川日升昌就可以兌換現銀。後來，以銀錢匯兌爲業的票號便應運而生，極大地方便了商業的付款方式，不但使一批晉商發了大財，而且促進了商品流通和生產力的發展。雷氏也由此成爲中國近代金融業之鼻祖。

到了咸豐年間，北京已有約三十家票號。票號初期主要經營匯兌業務，後來也經營存放款業務。創辦票號的初期，經營票號的主要還是山西人。

隨着票號的風行，錢莊（銀號）也不甘後人，繼晉商之後，北京又出現了著名的錢莊「四大恒」，它們是：恒興、恒和、恒利、恒源。東家都是浙江寧波人，地址都設在東四牌樓附近。四大恒的資本雄厚，信用良好，又專門結交官僚富商，存放的款項大部分是清宮內務府和各旗籍官員的。四大恒也向北京各大當舖發放貸款，成爲主要爲高官顯貴、富商服務的銀號。當時北京人要顯示身份高貴，講究頭頂馬聚源，腳踩內聯升，身穿瑞蚨祥，腰纏四大恒。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北京各家的銀號、錢莊慘遭浩劫。據說四大恒的白銀，八國聯軍用了三天時間才搶運完。

到了清末民初，前門外西河沿、錢市胡同、施家胡同成了衆多私家銀號的聚集地，這裡集中了浙江、山東、山西、河北、潮州等地的鉅賈，在此開了多家銀號。據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的統計，北京從事銀錢兌換業務的錢莊有五十八家、兌換莊七家、匯兌所三十七家。一些有信譽的商家也涉足其間，如柳泉居飯館、稻香春食品店都做過存取款業務。

一九〇六年，清政府的戶部銀行在北京設立，到了一九〇八年改名爲大清銀行，實際上是國家銀行，在全國設有二十多家分行，辛亥革命以後又改組爲中國銀行。一九〇八年清政府郵傳部在北京設立交通銀行，其宗旨是振興鐵路、航運、郵務、電信。隨後北京又相繼成立了北洋保商、興業、儲蓄、信誠、新華、鹽業、中孚、金城、農工、大陸、實業等銀行。它們大多設在前門附近，形成當年北京的金融圈。